



行龙 著

以水为中心的 晋水流域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以水为中心的 晋水流域

行龙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 / 行龙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203-05878-6

I. 以... II. 行... III. 水利史—山西省 IV. TV-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5897 号

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

著 者:行 龙

责任编辑:赵虹霞

出 版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20(发行中心)

0351—4922208(综合办)

E-mail: fxzy@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荣博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5

字 数:120千字

版 次:200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5878-6

定 价:12.00元

目
录

晋水流域水资源日趋匮乏的历史考察

一、人口、产业与生态	3
二、水案种种	13
三、传说、惯习与制度	16
四、“水神”与水权	21
五、余论	26

晋水流域 36 村水利祭祀系统研究

一、晋水流域水利开发史	32
二、晋祠“主神”三易其位	37
三、“水母娘娘”	46
四、“张郎”及其他	52

五、余论	57
------------	----

晋水流域的环境与“峪水为灾”

引言：“时过境迁”环境史	63
一、“枕水际山”：晋水流域的环境要素	68
二、“峪水为灾”：明、清以来的环境恶化与灾害	76
三、“长时段”：并未完结的演变过程	87

内地乡绅刘火鹏的人生轨迹

引言：《退想斋日记》的发现与研究	97
一、奋志青云：五次科考	101
二、舌耕度日：塾师廿年	111
三、亦农亦商：最后的岁月	118
四、士农工商：社会结构的变迁	124
五、华夷之辨：民族主义情结	130
六、新年旧历：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	138
七、吾爱吾乡：文化人的职责	148
结 语	153

后 记	157
-----------	-----

“晋祠流水如碧玉”，此情此景难复返。晋水流域水资源日趋匮乏的现实既是区域环境和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制度与文化、国家与社会纠葛互动的反映。



晋水流域水资源 日趋匮乏的历史考察

晋水流域即指三晋名胜——晋祠以难老泉为主要水源的方圆 36 村方圆 20 里的流域区。历史时期,晋水灌溉面积最大时曾达到 600 余顷,李白名句“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写翠娥”即咏此盛况。如今,昔日滔滔晋水溉田万亩的美景一去不返,10 年前甚至出现了断流的现象。信步名胜晋祠,睹物赏景,令人浩叹!

3

一、人口、产业与生态

晋水的开发和利用历史悠久,其渠系的形成当在春秋战国时代。史载,晋国世卿智伯欲取赵氏晋阳城,引晋水灌之,晋水最早以“智伯渠”问世。汉代当地民人已开始利用晋水灌溉田地。隋唐时代,晋水溉田面积进一步扩大,且两次修建跨越汾河的渡槽工程,解决了城东居民的饮水问题。

宋代晋水灌溉系统进一步完善,溉田面积达到鼎盛时期。“时晋水奔流,溉田无多,诸多田畴,水虽能及,乃

民皆惧以水加赋，悉不敢溉之为用，水竟付之东流。”^①太原尉陈知白“剴切晓喻”，并浚晋水源流为十分，一时溉田面积达 600 余顷，“晋水之水利无复有遗”。陈知白因此被乡民誉为“西门豹”。

宋、金之际直至元末，太原城郊成为中原统治者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争夺混战的重地。宋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赵光义放火焚烧古都晋阳。次年又引晋水狂灌晋阳废墟。晋水流域因迭遭战乱，渠系破坏严重，争水冲突日趋激烈，所谓“水利虽云溥博，而水争则极纷纭”。^②

4 明、清以来，晋水流域水资源的利用由共同分享走向激烈争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地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日趋紧张。明初太原地区也是全国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洪洞大槐树移民”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太原人在内。相对于太原府而言，晋水流域因得益于晋水灌溉之利，经济历来繁荣发达，村落集中，人口稠密。加之未受元末兵灾的影响，维持了宋、元以来的昌盛局面，人口压力一直未得到缓解。明太祖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屯田之策，晋水流域也不例外。史载，明初晋水流域有“九营十八寨”之说，随军屯而来的军队人口的突然加入，必然带来对当地资源的争夺。据统计，当时军户总数即达 2 万，这对于一个方圆 20 里的区域来说无疑是

①刘大鹏：《晋祠志》，卷十八，《流寓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478 页。

②刘大鹏：《晋水志》卷二，《旧制》。

一个沉重的包袱。另据安介生对明代山西藩府的研究表明,明中后期开始已出现严重的宗禄困境,“在无法逆转的‘宗禄困境’中,为争取既得利益的宗藩成员利用特权向地方官府不停地施压、抗争,而地方官府在无计可施的状况下勉力推脱,苟延时日。可以说,在明代中后期,在山西、陕西、河南等宗藩人口集中的地区,这种突出的矛盾与对立在地方官府与宗藩集团之间愈演愈烈,加重了地方社会的财政危机与社会危机”^①。晋水流域位于晋王府和宁化府所在地,首当其冲地要将流域内的资源优先供王府使用,并承担王府和地方官府的双重科派。在国家权力的威慑下,泉域社会内各村、各渠以至每个人都在为其生存而抗争。在保持和争取更多水权的同时,又进而为谋生计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古来泉域社会民众在利用丰富的水资源灌溉稻田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发展了多种与水密切相关的产业,主要是水磨业和草纸业,这两类产业在山西几乎所有泉灌区域均普遍存在。在晋水流域诸河利用水磨加工粮食与农田灌溉一样具有悠久的发展史。水磨大约形成于宋景祐四年(1037年)南北河分水之时。据刘大鹏《晋祠志》记载,直至光绪末年,晋祠正常生产的水磨共66盘,其中北河13盘,中河28盘,南河10盘,陆堡河15盘。水磨由木轮和两石盘组成,上石盘固定,悬挂在空中,上有一小眼为所加工粮食的入口;下石盘与木轮连

^①安介生:《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

在一起转动。由于晋水水量充沛,利用流水速度和势差冲击木轮旋转,再由木轮带动石盘转动,两石盘通过磨擦挤压,把粮食粉碎,形成各种粮食制品^①。至于水磨的生产能力,“北河水磨共二十盘,每盘一日磨粟一二石至三四石”^②。由于晋祠磨坊业发达,甚至影响太原的粮面价格,利益颇厚。晋水南河王郭村 73 岁的阎老先生说“水磨都是有钱人家的”。该村 75 岁的任老先生提到过去本村一位外号“残相公”的王姓财主,拥有 3 盘磨,900 亩土地,得意地宣称“三盘连夜转,九顷不靠天”,就是说即使在大旱之年,依靠水磨的转动,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即使老天不下雨,他家的田靠晋祠水也能丰收。晋祠风俗,富者以有水磨为美产,商人以守水磨为良业,商贾林立,车水马龙,水磨旋转,市场繁荣,晋祠遂成为米面交易中心。每天都有一批送面队伍到晋阳城和清源等地,河东刘家堡,北格等村的粮食多运到晋祠加工。西山煤矿众多,拖煤需用大量青壮年,是粮食和米面的主要消费区^③。正因为如此,晋水流域水磨业得以长盛不衰。由于水磨的大量存在,对水量的需求也相当大,这样在水磨业与灌溉业之间就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唐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颁布的《水部式》,被称为是“我国第一部水利法典,是唐代水利管理的一项重要创造”。

①③郝润川:《晋祠水磨》;杜锦华主编:《晋阳文史资料》第 5 辑,晋阳文史资料委员会,2001 年 9 月,第 246、247 页。

②刘大鹏:《晋祠志》卷三十四,《河例五》,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886 页。

其中早已对磨碾用水与灌溉用水作出规定,即如果碾用水与灌溉用水发生了矛盾或影响灌溉,必须停毁碾磨,以保农田灌溉:“诸水碾磨,若拥水质泥塞渠,不自疏导,致令水溢渠坏,于公私有妨者,碾即令毁坏。”就是说只有在保证或者不影响农田灌溉的前提之下,才能使用碾,碾不得与灌溉争利。但是,在晋水流域,受利益与生存的驱动,磨主往往依恃雄厚的财力,欺压农氓,为保证水力,不惜牺牲水户正常的灌溉用水,破坏水利设施,从而引起行业间激烈的水权争端,导致有限的水资源不能得到高效率的利用。

草纸业虽不似水磨业一样普遍,却也是晋水流域颇具特色、获利颇丰的副业。掩造草纸在处于晋水北河上游的赤桥和纸房二村最为发达。“赤桥村数十百家均赖造纸为生,一日无水则生计有碍。每岁春秋二季,决水挑河,赤桥水涸,村人均诣石塘洗纸,返造成纸易金钱,以养身家”^①。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也每每提及赤桥人家多数以此为生。另据民国《兰村、纸房、赤桥三村之草纸调查》统计:纸房村不制纸家 23 家,制纸家 21 家,分别占该村总人口的 52.27% 和 47.73%;赤桥村不制纸家 49 家,制纸家 78 家,分别占该村总人口的 38.6% 和 61.4%。^②三村厂主的籍贯以河南人为最多,本地人次之,

7

①刘大鹏:《晋祠志》卷三十,《河间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86页。

②应魁:《兰村、纸房、赤桥三村之草纸调查》,刘容亭主编:《新农村》,1935年创刊号,第3-4期。

五台人再次之。从地名志的角度来看,纸房村名的由来当与造纸业有直接的关系。草纸的制作工艺共分5个步骤,即蒸——碾——打洗——抄——洒。其中,第一、三和四步均离不开清水。纸房、赤桥草纸主要用作两个方面:最大用途为建筑时在石灰中掺和用;其次如包货之包装纸和家庭中常用之手纸。其出售区域,多为太原府十县范围内。该地草纸业究竟兴起于何时目下尚未考证清楚,但据晋祠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遵断赤桥村洗纸定规碑记》可知,该产业至少已存在数百年以上。造纸业能够在二村如此兴盛,有其根本原因:清流的经过是产生草纸业的重要原因。因为制草纸本是小规模小资本的手工业,若是就近不产生原料,而去较远的地方购买,因运费的关系,势难有利可寻,故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就近产生原料。其次制作的时候,需要经过洗涤的程序。若是没有便当的清流,势必碍工作,所以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很清的活水。二者缺一不可。居于晋水上游的纸房、赤桥二村占据地形之利,发展起这样一种“糊口”行业,但因水权和利益关系,也与其他用水者屡起争端。

随着人口压力的加重,单凭借水利型经济已无法维持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于是流域内众村民众将目光投向西山九峪。晋水流域背靠西山九峪,富含矿藏,尤以煤、矾等矿居多。在平地河谷开发罄尽后,晋水流域及本区域以外之人多赴深山,或开荒垦田,或开窑采矿,坐享资源之利。山中小村落多是围绕某一水源及可耕之田形成的,人户较少,多为十余户;一些山村形成则与煤矿、

矾矿开采有关。如《柳子峪志》记载:下舍村“村人夏秋耕田,冬春采煤,风俗朴陋”;平地窑村“村人半资耕种山田,半资采取煤矿”;山泉头村“家则二十余户,人则百十余口。风俗以俭朴为姻,人民以耕(田)凿(采煤)为业”;西窑“窑商、矾工居驻之室,多借占村人之舍宇,村之气象借此壮旺”;李家窑“窑之左右,建造舍宇,连接不断”。^①湾子里,“昔年老窑兴旺之时,山人作家于此者尚多”^②。

开垦耕田是以森林植被的破坏为代价的,很多土地纯粹采用粗放式的开发经营,首先,人类活动在深山地区的增多,随即带来对山地生态环境无止境的破坏。如木林沟,原来“一沟深邃,树木成林”,后“峪人恐有恶虫凶兽,潜伏其身,致遭其害,将木渐次砍伐,俾树凋零,今不成林矣”,有诗曰“昔日成林今不林”^③;杨树坪,“在昔杨树成林……于今无一杨,仅有桃杏数株而已”。究其原因,刘大鹏引用《战国策》曰:“‘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十人拊之,一人拔之,则无杨矣。且以十人众,拊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拔者,何也?拊之难,而去之易故也’。杨树坪之无杨,其斯

①分别引自《柳子峪志》卷一,第1226页;卷六,第1400页;卷五,第1369页;卷一,第1245页;卷五,第1382页。见刘大鹏著:《晋祠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民国《明仙峪记》卷一,第1125页。

③民国《柳子峪志》卷六,第1406页。

之谓欤？”^①其次，山中凡可耕之处，几乎开发殆尽。如猫儿沟，“峪中山田，层层叠叠，不一其亩”；下舍村，“北高处山半，田辟无多，名曰小坪。再上田多者，曰大坪。村人耕此两坪田亩，藉以粒食。其田层叠，俨若鱼鳞”；^②席坪，“明仙村人并各窑户多取汲于斯，井泉以上土田层叠，可种可耕。其再高处为上席坪，畎亩纵横，重重叠叠，阡陌衔接，约有数顷，较下席坪为多。厥土黄壤，厥田上下，荒芜者不少”^{③④}。土地的复种率不高，经过几次耕垦后即丧失肥力，成为荒田。这样的情况并不止限于明仙、柳子二峪，其它几峪亦类似于此。

西山九峪以煤为主的矿产资源开发最盛，大小煤窑、矾场星罗棋布。据统计，咸丰、同治年间仅柳子峪一峪即有煤窑 73 处^⑤。西山九峪之煤矿开采起于何时，笔者不甚详悉。《柳子峪志》关于“攻窑”（即开煤窑）的最早记录是清乾隆年间。因此，本地煤窑的开采不应迟于清初。需要指出的是，采煤业作为明清以来本区域新起的一种新兴产业，确实为本地和外来开发商带来了不菲的利润，以至于清代和民国期间绅民仍竞相开采，蔚然成风。但是，采煤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采煤需要在山

①民国《柳子峪志》卷五，第 1385 页。此外，乾隆三十八年《下舍村栢树坡碑记》（见民国《柳子峪志》卷一）所记的也是山人趣利，滥伐山林致兴讼的事情，同样反映了西山九峪在明清之际遭过度开垦，森林植被不断遭受破坏的情况。

②民国《柳子峪志》卷一，第 1222、1228 页，卷五，第 1396 页。

③民国《明仙峪记》卷二，第 1140 页。

④该数字系根据《柳子峪志》中相关资料统计得出。

中造屋建矿,这就需要消耗大量木材,山中木材虽多,却也经不起这样长久的砍伐。同时,无规划,无节制地挖掘,不但不利于矿产资源的有效开发,使山中遍布荒弃的废窑,而且导致地下水层被破坏,影响水源的循环。人们在为生计而垦荒与“攻窑”的过程中,西山九峪的生态环境默默地发生了变化。

立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重修石堰德政碑记》^①记载了如下内容:“吾邑僻处省南,地非饶沃,止以汾晋二水交流其间,种稻种麦,无忧荒旱。惟遇大雨之后,汾河发涨,县东数十村多被淹没,县西边山一带又为山水冲决,民之受害久矣……南、北大寺两村旧有沙河石堰屡被峪水冲毁……”汾水对本流域村庄的危害,刘大鹏在《晋水志》中也有提及:“光绪二十年前后,汾水大涨,田畴淤高,稻田大减,禾田增多,其村东北有县东渠,自阳曲县境引汾水北来,流入县境,经南屯、吴家堡、贾家庄、东关村,东关厢抵村东北以溉营东之田。”^②这也说明清末晋水已有不足应用的情形。“光绪丙申(二十二年)戊戌(二十四年)辛丑(二十七年)连遭汾水大涨之患。汾水自南北瓦窑两村之间溢出西岸,将鹅归店南北河下、五府、小站、东庄营、新庄、南太寺、东庄、濠荒野场、监军庄、万花堡、三家村、王郭村等俱受汾水大患,其第三次更甚”^③。由此可知,晋水流域之村庄不但屡受西山诸峪山洪暴发之害,且时常面临汾水泛滥之

①此碑现立于晋祠北门外沙河岸边,由北大寺村任晋祠二中教师的武炳生提供抄录稿。

②③刘大鹏:《晋水志》卷三,《水利》。

灾。“民之受害久矣”，表明晋水周围村落受诸水之害已不只是清末才有的事实。花塔村 86 岁的张老先生回忆说：“沙河在下雨时经常发水，水中掺泥带沙，经常冲毁稻地庄稼，冲坏渠道，过去年年要修渠挑渠。”本村另一位 78 岁的老人讲道：“水地、稻地越来越少，那时候（民国）就已比以前少，现在越发少了，全变成了旱地。”小站营村 83 岁的武老先生说：“以前风峪常发大水，淹没村庄。山里水冲下来，渠也毁了，地也埋了。我村地势低，水退不出去，经常被淹。”长巷村 56 岁的吴先生说：“听我爷爷讲，以前明仙峪里有长流水，后来就没有了，一直是干的，打十米深也不见水……以前有个西堡村，后来被大水冲了，整个村子都没了，地水都归了我（长巷）村。”^①上述情形表明清末及民国年间晋水流域不但水患频仍，而且水资源匮乏的状况已相当严重。

由此可见，晋水流域不但在水利型经济诸产业之间存在潜在的用水冲突，而且随着垦殖、砍伐山林以及“攻窑”等无节制、无规划的开发活动的持续进行，其周遭生态环境已趋于恶化，这反过来加剧了用水的紧张局势。众多争水事件和水事纠纷的涌现即是用水需求量的加大、水资源不敷使用的明证^②。

①以上引自 2002 年 3 月 8 日—3 月 12 日《晋祠田野调查报告》。

②应当指出的是水资源总量不足固然是引起争水事件的主要原因，然用水制度、技术、社会等方面的因素也可能导致冲突产生。历史地看，晋祠泉水流量确实是减少了，但是否是明清时候开始减少的，尚未有更为有力的证据。从相对意义而言，甚至可以认为是水的承载力有限，无法供养过剩的人口。相对于人口的增长和用水需求的增加，水和土地等资源就显得相对不足了。